

符号学视野下抗疫纪录片的人民性文艺符码研究

金珊

(福建商学院 传媒与会展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12)

【摘要】互联网时代的话语体系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符码的创作面临能指的泛化和所指的窄化等困境。以“抗疫”为主题,选取富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作为研究对象,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人民性文艺符码的重塑策略。解读抗疫纪录片对主流意识形态召唤的正项表达以及“刺点”设计,融入异项风格的对抗和翻转,探寻艺术作品与人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利于厘清后疫情时代抗疫纪录片创作的价值引导趋势,众筹式抗疫纪录片、微抗疫纪录片或将成为书写人民性文艺符码的主流。

【关键词】人民性; 抗疫纪录片; 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00(2021)04-0077-06

“人民性”作为文艺创作中最重要的符号之一,是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指南针”。文艺创作应与时俱进,创造出与当代社会现实相符的文艺作品。后疫情时代随着抗疫正能量的持续输出,短平快的新闻报道已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一系列抗疫题材纪录片的成功推出,彰显了全民战疫的团结精神以及医护工作者们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本文以“抗疫”为主题,选取富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作为研究对象,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人民性文艺符码的重塑策略。

一、人民性文艺符码面临的困境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社交媒体对民众的全面浸染,“人民性”这一文艺符码在当前语境中面临诸多困境。

(一) 人民性文艺符码在能指层面的泛化

符号学家索绪尔把符号视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

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和对应。“符号的意义作用基本上是通过符号形式(能指)和符号内容(所指)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但是意义表现的过程并没有到此结束。”^[1]“人民性”在能指层面主要集中在“人民”“人民性”等字面上的形式。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坚持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热爱人民”等^[2]。当这些符号出现在社会话语体系中,势必因其所产生的“陌生化”间离效果,延长受众解读符号信息和感受“人民性”魅力表达的过程,使其在适当的时机将这一约定俗成的意蕴和内涵传播给受众,并且吸引受众积极主动探索符号意义背后的解读,最终完成能指和所指对等化的符号真实塑造的目的。但随着商业大潮的全面浸染以及融媒体环境下网络平台的飞速发展,

收稿日期: 2021-07-03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交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创新研究”(JAS20233)。

作者简介: 金珊(1985-),女,福建福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 新媒体传播。

信息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这将导致能指的完全泛化,即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崩塌,深层的内容及背后的意义被抛弃。当“人民性”这一符码迷失于海量信息涌动的社交媒体之中,受众也将错过本应存在的对所指内容的思考和解读。

当然这种在能指层面上的泛化并非指历时性维度上的错位和共时性维度上的裹挟,更多表现在对“人民性”符码的过度使用,常见于借用人人平等的“公民性”来落实“人民性”或是佯装以“新人民性”和“后人民性”进行多种资源的配置,脱离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违背文艺创作的初衷,从而弱化和疏离真正的“人民性”。从艺术创作本身来说,创作主体及受众之间存在着对于“人民性”符码的博弈,通过替换或逃脱真实的能指“制造幻觉”来达到哗众取宠的负面所指效果,换取商业利益,甚至当能指在尚未获得受众反应时,就被无数的媒体先行轰炸。因而,“人民性”的基本含义不应也不能改变,坚决防止那些与“人民性”异质的“新人民性”“公民性”或“后人民性”来做其替代品^[3]。

(二) 人民性文艺符码在所指层面上的窄化

社交媒体的盛行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约定俗成的符号意义也在不断更新,受众不断增加的精神文化需求同“人民性”符码在所指内容上的窄化和固化发生矛盾。符号是时代的产物,需要在文化的洪流中不断演变和沉淀,“人民性”符码在文艺创作中的所指已然超越和衍生出更多意义,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不与时俱进,还停留在所指层面的简单延伸,传受双方的对话性将受到严重影响。

“人民性及其相关符号体系在当下文艺环境中的位置显得尴尬:向左走,就成为了政治的附庸,表达的内容也容易沦为空洞的呐喊,无法体现文艺自身的特点。向右走,就变成了商业经济的爪牙,按照交换的主体间性来自我建构,躲避文艺自身的审美深度”^[4]。在网络时代下,“人民性”符码要为广大受众所接受,需要进入市场,依赖能指包装从

而完成其“所指价值”生成,但常常被边缘底层叙事和“俗文化”所裹挟,产生符号摹本,从而降低了文艺创作本身的崇高性。长此以往,“人民性”被商业所裹挟失去了其本真的魅力。如何在商业属性的能指包装中内隐主流核心价值观的所指,并合乎情理融合新的时代特征和趣味性任重道远。

二、抗疫纪录片对人民性文艺符码的重塑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疫情防控所呈现的舆论场域空前复杂。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加大宣传舆论工作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我们广泛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引导人民群众正确理性看待疫情,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我们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特别是群众的集中诉求,不回避矛盾,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5]。对待复杂舆情所体现的科学态度进一步体现了人民性文艺符码在舆论引导中的重要性。虽然“人民性”符码在文艺的发展进程中遭遇了能指和所指层面上的困境,但要想解决当下的难题,仍需通过人民性文艺符码进行溯本清源,抗疫纪录片的适时出现调和了当前的矛盾,通过重塑人民性文艺符码,为被商业裹挟的文艺创作打造出一条新的路径。

(一) 抗疫纪录片对人民性文艺符码意识形态的召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以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2]。从范俭导演走近武汉最底层社区拍摄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到范士广导演以医护人员群体的视角记录《人间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再到疫情期间最受关注的自

媒体创作者林晨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武汉日记》，以及优酷视频与大象记录联合发起全民合拍第一部全景式的抗疫纪录片《一日冬春》，都是从最日常的角度刻画出医护人员、志愿者、清洁工、基层党员和社区民众等一个个鲜活的“普通人”不平凡的事迹，真实反映出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抵抗疫情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林晨的《武汉日记》中五段“武汉up主实拍”记录了疫情“封城”后武汉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在哔哩哔哩网站上高达2522多万的播放量，足以窥见民众对抗疫题材纪录片的需求和共情作用。抗疫纪录片也因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以被符号整合，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进行意义传播和接收，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人民性文艺符码的群体召唤。

罗兰·巴尔特说“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和一种行为结合起来后，实际上立刻变成了一种价值语言。”^[6] 抗疫纪录片中对个体的人民性符码的书写融载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从而让正项价值得以体现。以纪录片《人间世》抗疫特别篇的开场为例，其符号指示过程如表1。

表1 《人间世》抗疫特别篇开场的符号指示过程

Tab.1 Symbolic indication process of the opening of *Life Matters COVID-19 Response Special*

第二符 号系统	E (能指) R (意指)	C (所指) 人性的温 暖 and 抗疫的希望
符号的 初级系 统	E 新冠肺炎患者80 岁老人的截肢事件 R	C 医护人员高尚无私 的精神

从表1可见，一个符号初级系统的建构过程首先是受众感知到这是一位新冠肺炎和糖尿病并发症的80岁老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的肺炎好转而右腿却面临坏死急需截肢的事件是该符号的能指，在头脑中所唤起的对该事件的所指是医生不顾危险争分夺秒进行救死扶伤的英雄形象。正是这第一符号的表达面构成了第一行中所体现的第二符号系统的内容面，而这产生的新所指即是罗兰·巴尔特所强调

的“内涵”，在表1中体现为在生病与死亡面前所展示的人性的温暖和抗疫的希望，所指不再空洞且窄化，反而在受众的解读中自然召唤出富于正能量的意识形态。

当符号、对象、解释项三者形成一种合力后，所产生的符号活动在传统的能指和所指所形成的符号活动的内部空间以外，对象将进一步被弱化，承担“新所指”重担的解释项将和其他的符号活动相关联，使得这一正项的人民性意识形态产生“无限衍义”的解释项，自觉促成其意义在符号网络乃至更大范围的生成与传播，新媒体环境下疫情防控的良性舆论引导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 抗疫纪录片对于人民性文艺符码“刺点”的书写

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提出过一对拉丁词叫做 *Studium/Punctum*，我国学者赵毅衡将其译为展面和刺点，并认为展面体现的是人类普世的情感，更多的是创作者和受众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俗成；刺点只在某些场合才会出现，“是一种偶然的東西，正是这种东西刺疼了我（也伤害了我，使我痛苦）”“不在道德或优雅情绪方面承诺什么……可能缺乏教养……像一种天赋，赋予我一种新的观察角度”^[7]。可见，刺点不同于展面更为理性的展示，更多的是基于特别的角度对日常状态下的破坏以及给予观者偶然且强烈刺激性体悟的艺术性观感。赵毅衡也提出，“艺术是否优秀，就看刺点安排得是否巧妙”^[8]。

抗疫纪录片是在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艺术化表达形式。随着影视创作工具的进步，能通过较短的制作周期以及丰富的镜头能指在双轴关系中展开，将“展面”和“刺点”进行合理把控，向观众快速清晰还原疫情当下的真实情况，吸引观众介入。在六集抗疫纪录片《人间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中，范士广导演以医护人员抗疫日常与患者们的鲜活故事展现了符号文本的“展面”，而“刺点”的设计被安排在第4集《脸庞》

中,即通过医护人员的口述产生“纵深式的反差”。作为纪录片的常规性操作,大多展现出具有矛盾冲突的人物故事,但在抗疫特别节目系列中却打破了往常的结构。前三集医护人员抗疫故事先做铺垫,他们在抗疫中的日常生活及作为医者仁心的身份属性给予了受众较为普遍的聚合段,前三集画面的叙述都是由旁白介入强调医护人员所担当的责任,形成符号文本的展现。到第四集时,医护人员正面对镜头的脸庞以近特写的镜头交替出现在画面左屏和右屏,最终将他们口述的文字以碎片化的形式组合,特写镜头越来越远,变成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的虚拟图像,形成了全集的高潮。这个风格的变化,也形成了具有鲜活个人化体悟的“纵深式刺点”,让受众在聚合轴上思索医者身份的再现,不同于媒介所塑造的“英雄”身份,但有着最寻常的真实情感,具有一定的文化符号寓意,更易收获普通民众的尊崇。

此外,创作工具的进步也是抗疫纪录片书写人民性符码重要的基础之一。无人机航拍的视角在抗疫纪录片的广泛使用带有明显的“刺点”效果。林晨的《武汉日记》中“医院、医生、武汉人生活情况”这一集的开场效果显著,大年初一本应车水马龙的武汉长江二桥因为疫情变得空空荡荡,下一镜头通过光影切换回到日常的武汉长江二桥,金黄色的阳光映射在河面和桥上,将武汉繁忙的景象体现出来,前后两个镜头的衔接对照在航拍的视角下一览无余,无声地预示着疫情对武汉人民生活的改变,以及武汉全民居家抗疫、静待花开的勇气。同时光影变化下航拍画面不同造型处理所产生的魔幻感和陌生化效果,为受众们带来了强大的视觉震撼以及心灵冲击,明与暗、虚与实的对比等“刺点”的设计展现出特殊时期的武汉,给予了受众与众不同的符号审美情趣,同“抗疫”这一主题交相辉映,极富艺术感染力。

(三) 抗疫纪录片对于人民性异项风格的文艺符码的翻转应用

赵毅衡《符号学》中把“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

称为正项,把中项所排斥的称为异项,即标出项。”^[9]可见正项代表了主流和约定俗成之意,异项更多存在于亚文化圈中。人民性文艺符码为社会正项,顺应主旋律及社会发展,形成了大多数受众对正项的偏边认同,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但异项风格的戒除平庸化所呈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标新立异重塑了符号建设,使人民性符码有了反思和深度认知的可能性。

抗疫纪录片作为灾难题材纪录片,以一种非虚构的方式在现场真实记录灾难的全过程,是具有正项风格的传统纪录片类型。但自媒体的发展及疫情防控的空间限制,让抗疫纪录片在保持正项表达的同时,异项风格的标出性也存在并引入,两者在对抗且和谐的关系中并进,积极反应社会真相,有效地进行舆论引导和监督,从而促使正项的主流价值观更加稳固,并有了更为人民所需求的推陈出新的表现。

秦晓宇导演的纪录片《一日冬春》作为“全民记录时代”的代表作之一,即是异项风格翻转同正项共存的最好体现。《一日冬春》同传统的抗疫纪录片最大的差别来自于拍摄并不在现场,它邀请了全国各地将近5000名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处境下的普通人拍摄从2020年2月9日0点0分到2月10日0点0分——武汉“封城”第18天这“一日”的生命片段,通过筛选整理时间线,共同形成一部中国人的抗疫影像日志。对于合拍记录的异项风格的选择构成了与正项的对立,集中反映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及小人物的“一己之真”,但对于个体最真挚的情感体现通过亚文化的主观技术的再现,已经或多或少融入群体的全景式记录。疫情大背景下个体“可视化”的联结,使得同正项表达的对抗慢慢停止,与正项人民性所体现的“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价值观如出一辙。

随着民间影像记录的兴起,抗疫纪录片不再局限于大场面、大制作等全局式的角度,越来越包容民间创作者发出自己的“抗疫”微声音,比如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与快手联合发起的首部抗疫手机纪

纪录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全国首档医务人员直击抗疫一线VLOG《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记》、融媒体短视频《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等，通过异项风格的翻转应用，清除了自身明显的标出性，形成一种既含有旧符号又涵盖新语境意义的开放性、螺旋式的演绎，从侧面来说有利于正项价值观的体现，也是人民性文艺符码重塑的必要选项。

三、抗疫纪录片书写人民性文艺符码的新进展

(一) 以意动性符号传播的内容众筹式抗疫纪录片或成为主流

符号意动性是什么侧重于接受者的文本都有的品格，例如说“这里很热”，听者很容易明白这是让其去开窗，哪怕这句话并没有用祈使句形式^[10]。随着疫情的持续以及抗疫行动的深入展开，受众们已经无法满足短平快的新闻报道所获取的信息需求，抗疫题材纪录片的出现汇合了受众周遭的经验文本，以一种特殊的阐释视角将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联合起来，特别是民间话语的兴起满足了受众深入获取讯息的互动需求，深化了他们的认知结构，从而将美学阐释的过程重新建构在不同性质和不同联觉的基础上，最终产生对社会性存在的真实性的一种自我认知，这与惯常的一度区隔的纪录片有着本质的不同，更具有意动的功能。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纪录片的拓展和突破呈现出不同态势。疫情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深入疫情一线的专业化主流团队数量极少，并且无法快速制作完成纪录片，以适应受众快节奏获取信息的需求。抖音、快手、bilibili等平台分享的便捷性，使得“纪实+众筹”这个字眼开始出现在受众的视野中。纪录片的影像符号本身就具有意动性，在人人创作的特殊时期里，以意动性符号传播为主流的内容众筹式抗疫纪录片已然成为书写人民性文艺符码的主流。

《一日冬春》的导演秦晓宇发起内容众筹计划时提出，“记录是为未来而著史，因为我们太健忘了，容易重蹈覆辙；记录是对生活世界的追问，疫情肆虐，如当头棒喝，当此际，每个人都该发出自

己的天问”，这其实就是抗疫纪录片存在的意义。抗疫纪录片不止是验证抗击疫情的过程及宣扬抗疫精神的伟大，它的书写更在于“意动”——行动邀请性。阿尔都塞在谈到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的戏剧时指出“他想要把看客变成演员，来完成未结束的戏。”^[11]每个身处其间的人都可以参与，从中得以“内容众筹”发出自己的疑问，并给出受众自我行动的意义所在，从社会学意义上来呼唤爱和真正改变的动力。此外，由于少了对“经验显示素材”的使用论证，内容众筹式的抗疫纪录片往往更具有意动叙述的张力，受众的信任度更高。

(二) 微抗疫纪录片模式将被广泛应用

随着融媒体的飞速发展，受众可选择接受信息的平台和渠道增多，传统的以画面+同期声为主的宏大叙事型纪录片的观看人群大幅减少，大众越来越青睐于轻操作、低成本、接地气并具有强互动性的微型纪录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推出的九集融媒体系列短视频《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的成功可见一斑。该视频每集五分钟，以2020年2月4日至12日中武汉疫情的亲历者们作为视频日记的主观视角，讲述了整个武汉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温暖故事，达到了1.57亿的视频观看量，深受观众的欢迎。最具“网生代”气质的第三集还采用了先进的电视科技手段，将云摄像头作为该集的主人公，被网友戏称为“摄政王”。在AI机器人仿真声音的自述中展现了火神山和雷神山与疫情赛跑的“中国建设速度”。其中大量的表情包和网络语言的使用以及直播互动数据的表白，让受众快速进入到编导所建构的符号语境中，满足了他们的参与感和沉浸式体验，最终完成以平民的微视角呈现宏大主题的主题转换。

四、结语

人民性文艺符号的重构体现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主流价值观，是作为正项的一种符号表达。抗疫纪录片的成功，弥补了我国重大事件题材纪录片在人民性文艺符码创作上的短板，将官方表达同民间叙事联结起来，将叙事的主要力量交

给普通民众，还原生活的本真及美好，展示了真正的“抗疫精神”，发挥着引导舆论的作用。身为文艺创作者，我们应该努力解决能指的泛化和所指的窄化困境，丰富“人民性”符码的形式和内涵，从人民的个体性和平民化入手，选择更多元化的拍摄角度和微记录，巧妙地安排好“刺点”，在正项表达中融入异项的对抗和翻转，最终将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主流的价值观传播给受众。

参考文献:

- [1]李思屈. 广告符号学[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 [2]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10-15(02-03).
- [3]马建辉. 新世纪文艺人民性研究的三种倾向及其辨析[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3(6): 43.
- [4]焦垣生, 王哲, 王新童. 日常审美语境下人民性文艺符号建设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1): 95.
- [5]习近平.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 新华社, 2020-02-23.
- [6]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李幼蒸,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7]VAL L. The timely and the timeless: syntagmatic and paradigmatic sign relations in advertising montage [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2005, 32: 162-163.
- [8]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修订本)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9]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0]赵星植. 论元媒介时代的符号传播及其特征[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86
- [11]LOUIS A.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69.

Research on the People-oriented Literature and Art Code in Epidemic Response Document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JIN Shan

(School of Media and Exhibition,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internet age, the creation of people-centered literature and art code is facing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generalization of signifier and the narrowing of signified. Taking epidemic response as the theme, this paper selects influential documentaries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analyzes their strategies for reshaping people-oriented literary and art co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It is helpful to sort out the value guidance trend of the creation of epidemic response documentar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o use semiotics to interpret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the documentaries on mainstream ideology, employ the design of Punctum, integrate the confrontation and turning of heterogeneous styles, and explore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works and the people. Epidemic response documentaries with gathered clips and micro-documentaries may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writing people-oriented art and literature codes.

Key words: people-oriented; epidemic response documentaries; semiotics

(责任编辑: 练秀明)